

#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 Overinterpretation

Overinterpretation

Umberto Eco

Richard Rorty

Jonathan Culler

Christine Brook-Rose

Umberto Eco

[意] 安贝托·艾柯 等著

[英] 斯特凡·柯里尼 编

Stefan Collini

## 诠释与过度诠释

王宇根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Umberto Eco**

[意] 安贝托·艾柯 等著

[英] 斯特凡·柯里尼 编

**Stefan Collini**

# 诠释与过度诠释

王宇根 译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an

Overinterpretation

Overinterpretation

Umberto Eco

Richard Rorty

Jonathan Culler

Christine Brook-Ro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诠释与过度诠释 / (意) 艾柯等著; (英) 柯里尼编;  
王宇根译. —2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1

(文化生活译丛)

书名原文: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ISBN 7-108-02345-8

I. 诠... II. ①艾... ②柯... ③王... III. 文学理  
论-解释学 IV. I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4852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陆智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印张 5.25 113 千字

印数 0,001 - 8,000 册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

定价 13.80 元

# 目 录

|                     |     |     |
|---------------------|-----|-----|
| 导论 诠释：有限与无限 .....   | 柯里尼 | 1   |
| 一 诠释与历史 .....       | 艾 柯 | 24  |
| 二 过度诠释文本 .....      | 艾 柯 | 47  |
| 三 在作者与文本之间 .....    | 艾 柯 | 71  |
| 四 实用主义之进程 .....     | 罗 蒂 | 96  |
| 五 为“过度诠释”一辩 .....   | 卡 勒 | 118 |
| 六 “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 ..... | 罗 斯 | 133 |
| 七 应答 .....          | 艾 柯 | 150 |

# 导 论

## 诠释：有限与无限

斯特凡·柯里尼

### 一

“我惟一担心的是，这一话题是否会充分地与人文价值密切相关。”熟悉学术委员会运作情况的人一下子就会听出这句话里面的弦外之音。这一次，围坐在圆桌周围的是剑桥大学克拉尔厅（Clare Hall）“丹纳讲座”委员会的委员们。丹纳讲座（Tanner Lectures）由美国慈善家、犹他大学前哲学教授奥伯特·丹纳（Obert C. Tanner）于1978年7月1日在剑桥大学克拉尔厅正式设立。（它每年也在哈佛、密执根、普林斯顿、斯坦福、犹他等大学设立；也偶设他处。）此讲座声称，其宗旨是“推动并反思与人文价值判断和评价有关的学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发展。”我们正在谈论的1990年的这次讲座准备邀请意大利著名学者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主持，他所提交的讲题是：诠释与过度诠释（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开头提到的那位委员会的委员正是对艾柯提出的这个讲题深表担心和忧虑。然而，这种担心和忧虑并没

有持续很长的时间，随着讲座的实际进行，它一下子就涣然冰释了。

显然，对于拼命挤进剑桥大学最大讲演厅之一的克拉尔厅去听此讲座的近五百名听众而言，这种担心与忧虑根本上就不存在。也许有的人只是想来一睹这位当代著名作家的风采，以满足自己强烈的好奇心；也许有人只是不想错过目睹这次社会文化胜景的机会。然而这么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听此演讲这个事实却清楚地表明：除了演讲者本人磁石般的诱人魅力外，演讲的内容本身也必定自有其独特的引人之处。当你看到热心的听众第二天一大早就在讲演厅门口排起长队，等待着旁听艾柯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try），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和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三人的辩论时，任何人的担心与疑虑都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了。辩论会持续了一天的时间，由克尔默德（Frank Kermode）主持。自然，辩论会生动而热烈。阿姆斯特朗（Isobel Armstrong），比尔（Gillian Beer），波依德（Patrick Boyde），布特勒（Marilyn Butler）等知名学者与批评家（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参与给辩论会增添了不少丰富的色彩；特别是在场的一些小说家兼批评家——如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哈维（John Harvey）等——中肯而切题的评论则如一首首插曲，更加给严肃的辩论会增添了许多轻松欢快的气氛。

自然，艾柯是所有这些演讲与辩论的主角。安贝托·艾柯教授在如此众多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简直难以将他的研究归入某一个学科类型之中。他生于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在都灵大学主攻哲学，而做的论文却是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的。

他为意大利国家电视网的文化节目组工作过，其后边在都灵大学、米兰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教书，边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1975 年以来，他一直主持着波洛尼亚大学的符号学教席（这是全世界大学中所设立的第一个符号学教席）。他著述甚丰，在美学、符号学和文化批评等研究领域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已译成英语及其他语言出版。然而最令人惊异的是，人们不得不将其最近的几部著作回译为意大利语，因其原作是用英语写的——这无疑是艾柯教授杰出的语言才能的又一充分表现。同时，他还是位多产的新闻作家，为意大利好几家日报和周报定期写一些非常有趣的专栏文章。然而，艾柯教授却是——至少是在英语世界——作为《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 一书的作者而广为人知的。这部小说出版于 1980 年，现已畅销全世界。接着，在 1988 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小说《福柯的钟摆》(*Foucault's Pendulum*)。这部小说翌年即被译为英文，并且立即就引起了批评界的注意。

我们正在阅读的这本书是根据艾柯 1990 年丹纳讲座的讲稿、前面提到的三位主要的论辩参与者的演说词以及艾柯的答辩词修订编辑而成。由于所论辩的问题对于那些没有机会亲自参加辩论会的读者而言也许过于抽象或者过于专门化，因此，勾勒一下辩论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及论辩者之间所存在的分歧的基本轮廓，简单地探讨一下占据 20 世纪后半期文化批评与文化理解之核心位置的理论问题所具有的深远的意义和内涵，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 二

“诠释”(interpretation)自然并非20世纪文学理论家们所独创。由怎样描述诠释活动的特征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论与困惑在西方具有很长的历史。这一问题首先是由试图确立“上帝之言”的意义这一极为大胆的想法所引起的。其近代阶段始于19世纪初,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所建立的圣经诠释学导致了对“本文的意义”这一问题高度自觉意识的产生;到了19世纪末,狄尔泰(Dilthey)便将施氏的神学诠释学进一步推向普遍化和理论化,诠释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理解人类的精神创造物、探讨整个“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次辩论,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它所赖以发生的、最近二三十年来的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以及在此历史时期和历史语境之中学术思想的两大发展趋势。首先是1945年以来席卷西方世界的高等教育的急剧膨胀给许多问题——譬如,被教育机构界定为“学科”(disciplines)的那些东西的“身份”(identity)与地位的问题——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大大影响了教育机构在文化发展中的基本作用。在英语世界中,“英语”作为一门学科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非常特殊的中心地位,它变得异常灵敏,逾越了那道使其与“门外”读者隔绝开来的专业高墙,成为一门与普通人的忧乐戚戚相关的学科——这意味着,别的不说,专业领域内的论争不时地会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和焦点。有个简单然而却令人惊异的事实可以表明这一学科受到人们

青睐的程度：1970年，在全美三分之二的大学和学院中，英语系乃最大的本科系<sup>①</sup>。

然而，最近几十年来，传统上被视为构成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经典”（the canon）以及与此有关的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受到了更为犀利、更为精细的重新审察。其原因是，“经典”以及与此有关的研究方法所赖以形成、所赖以立足的社会观念与种族观念在当今世界上不再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地享有主导地位。而美国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支配着个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市场原则也为其推波助澜，其结果是，那个第二性的、纠缠不清的观念的混合物（就是现在被称为“理论”的那个东西）竟成了知识的中心竞技场，在此竞技场上，人们沽名钓誉，四处笼罩着一片争权夺利的战火与烽烟。对这种学术机制背景的关注也许无益于理解关于诠释问题的论争所牵涉到的实际内容；然而，如果你想理解人们所投入的热情与得到的结果之间所出现的明显的不平衡与强烈的反差、如果你想理解广大的公众社会对关于这些神秘莫测的问题的论争所给予的关注的强烈程度的话，了解一下这种学术机制变化的背景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这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学术思维发展的第二大趋势——这第二大趋势，我们曾说过，同样赋予关于诠释问题的论争以重大的意义：具有独特的学术传统与思维方式的欧洲大陆哲学体系与重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精细的批评性解读、分析与欣赏的盎格鲁—

---

<sup>①</sup> Richard Ohmann, *English in America: A Radical View of the Profession* (New York, 1976), pp.214—215. 欧门在此书中强调了大学中普遍开设的“新生作文”课对这种学科膨胀的巨大影响。如果想获得更全面的历史的了解，请参见 Gerald Graff, *Professing Literatur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Chicago, 1987)。

撒克逊传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暗示这两种传统彼此之间能更好地相互理解与宽容这种善良愿望的任何其他动词都将不无遗憾地对二者发生遭遇的本质做出错误的表述)。同样,这一发展趋势也必须从一个更远的历史视角去加以探讨。在20世纪英美文学研究不断追求专业化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路途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出现了:19世纪遗留下来的、对文学进行“历史”考察的研究方法受到了一种新的批评实践的强烈挑战,并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批评实践所代替;这种新的批评实践受当时势头正旺的“科学”方法的影响,试图对“伟大文学”的经典作品的语言细节进行敏锐而精细的分析——在英国,这种批评实践是与瑞恰兹的“实用批评”联系在一起的(更远一点,或者更复杂一点而言,也与艾略特[T.S.Eliot],利维斯[F.R.Leavis],以及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等人的批评实践有关);在美国,则与“新批评”有关,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布莱克默(R.P.Blackmur),沃伦(Robert Penn Warren),泰特(Allen Tate),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维姆萨特(W.H.Wimsatt)。这种批评实践最终——特别是在美国——产生了它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与价值判断标准,其核心观念是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审美的客体,认为无依无傍、自由自在地阐述文学文本意义产生的动态机制正是文学批评家的主要任务。由此核心学说派生而来的一个“次生”观点是对所谓的“意图谬误”的否定:认为作者在写作文学文本之前的主观意图会与确立文本——维姆萨特称之为“语言符号”(verbal icon)——的意义有关这种看法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误。(这些学说被认为原则上适用于一切文学类型;但人们早已清楚地认识到,它们主要是在

对抒情短诗的批评实践中发展而来的。用这些理论去批评抒情短诗最不会显露其笨拙之处，因为抒情短诗里面有着丰富的“张力”与“复义”，而确认并分析这些张力与复义正是新批评家的拿手好戏。）

这种对待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态度与学说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英美大学的文学系中逐渐获得压倒一切的中心支配地位（虽然这种支配地位从没有达到垄断一切、一统天下的地步）。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对于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特别是诠释学、现象学与结构语言学的传统发展而来的非正统的意义观念而言，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某些基本观念向其他领域的渗透及其与列维－施特劳斯人类学理论的部分结合，更是促使自 50 年代晚期以降，在许多研究领域，甚至在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学者们都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寻求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下面的深层结构以及反复出现的模型。这种寻找深层结构与模式的做法与被重新激活了的、对人类活动的可能性进行超验探寻的“后康德主义”遗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一种旨在对意义、对沟通以及其他的类似主题进行深入精细探讨的非常抽象的普遍性理论的产生。（对符号进行研究的符号学或符号科学——艾柯本人即与此密切相关——乃这种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有两个领域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同样深入的研究：即那些受过哲学训练和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以及那些主要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将这些普遍性的理论更进一步地描述定位为“后结构主义”的做法部分地只是出于新闻记者们“贴标签”的需要，但它同时也揭示出：索绪尔对“能指的任意性”的强调早已成为最近一些理论研究和探索的出发点，特别是雅克·德里达对写作中意

义“不确定性”的令人耳晕目眩的研究更是以其娴熟而精湛的技巧将这些理论探索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这些相互作用的哲学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在英美大学中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却对传播由这些哲学传统所引发出来的文学观念充满了热情，其结果是使得关于文学研究之性质与目的的论争不断升温，越来越乱，到现在已成聚讼纷纭、争持难下之势。在此论争的过程中，认为确立文学文本的意义乃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合法目的的观点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批评。那种企图限制意义生成的语境范围或是企图使作品意义生成那无休无止、不断推衍的不确定性过程停止下来的做法，已被指责为“专制主义”——这种指责本身乃将复杂的理论问题与更为广泛的政治态度纠缠在一起。与此相反，另外一些批评家则提醒人们对此保持高度警觉，认为德里达那样对认知“确定性”的否定实际上依赖于“后笛卡儿哲学”的传统，我们不应以此为标准对所有本文约定俗成、众所周知的意义可能性投下怀疑论的阴影。他们指责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玩着双重的游戏，用自己所宣扬的那一套新的语言策略去解读别人的文本，而在向读者传播自己的那一套方法和标准时却又心照不宣地使用着大家都已接受的、约定俗成的方法和标准”<sup>①</sup>，试图通过指责别人而使自己的理论得到论证。

艾柯选择诠释问题作为其演讲的主题，旨在在目前有关意义的本质以及诠释之可能性与有限性这个不断深入的国际性大讨论

---

<sup>①</sup> M.H.Abrams, "How to do things with texts", 收入 *Doing Things with Texts: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1989), p.259.

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讨论中，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艾柯是六七十年代对读者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最热心、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然而，在其最近的著作中，艾柯却对当代批评思潮的某些极端的观念深表怀疑和忧虑，尤其是受德里达激发、自称为“解构主义者”的美国批评家们所采用的那一套批评方法——这种批评方法主要与保罗·德曼（Paul de Man），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的著作有关——对他而言，这种批评方法无异于给予读者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阅读”文本的权利<sup>①</sup>。艾柯认为这是对“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这一观念拙劣而荒谬的挪用。收集在本书中的文章旨在对此提出异议，试图探讨对诠释的范围进行限定的方法，并希望借此能将某些诠释确认为“过度的诠释”（overinterpretation）。

出于这一目的，他的第一篇讲演首先回顾了西方有关“秘密意义”这一观念的漫长历史——这种秘密意义的语言编码方式逃脱了除少数专家以外大多数人的注意。回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出某些当代理论的神秘论根源，使其看起来就像是久已存在的某些观念的重现，好像就是神秘论（Hermeticism）与诺斯替主义<sup>②</sup>曲折历史发展中的当代形式。一种知识类型越是隐秘不宣，人们就越觉得它神乎其神，可望而不可即；你越是一层层地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解读出其隐秘的编码，人们反而越是觉得它深不可测。因为往往只有进入“前堂”之内才愈觉“后室”不测之深。潜藏在这种诠释传统下面一个共同的心理原因是，人们对显

① 请参见艾柯将出的论文集*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② 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是希腊晚期和基督教早期的一种宗教与哲学思想与实践，主张神秘的宗教顿悟与救赎。——译注

而易见的意义往往持一种怀疑与轻蔑的态度。显而易见的意义是如此唾手可得，与普通常识简直没有什么区别，神秘论的追随者们认为，这对他们的地位与智力都是一种致命的浪费与损伤。

在其第二篇演讲中，艾柯力图使自己与神秘论思潮的这种现代形式离得更远。他相信，我们可以——而且确实能够——确认出哪个诠释是“过度”的诠释，而不必花费精力去证明另一诠释为“合适的”诠释，甚至不必依赖于认为一定存在着某“一个”正确诠释的任何理论。为了证明其论点，艾柯诙谐而风趣地举了一些很巧妙的例子。最显著的是19世纪盎格鲁-意大利作家罗塞蒂（Gabriele Rossetti）对但丁进行“罗塞克卢<sup>①</sup>式解读”的例子。艾柯对美国批评家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对华兹华斯那首诗的诠释的分析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旨在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哈特曼的诠释是如何逾越了“合法诠释”的边界的，尽管也许更多的读者会觉得哈特曼的解读使人深受启发而一点也不耸人听闻。艾柯提出了“作品的意图”（*intentio operis*）这个富于挑战性的概念，认为“作品意图”在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意义之源，它并不受制于文本产生之前的“作者意图”（*intentio auctoris*），也不会对“读者意图”（*intentio lectoris*）的自由发挥造成阻碍。“作品意图”的性质、地位和身份似乎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探讨，然而，从他早期对“经验读者”（the Empirical Reader）、“隐含读者”（the Implied Reader）和“标准读者”（the Model Reader）所进行的区分出发，艾

---

① 罗塞克卢主义（Rosicrucism）是一种特别关注于超自然的神秘符号与现象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源于17世纪初。——译注

柯用极富灵思的“作品意图”这一概念旨在揭示出：文学文本的目的就在于产生出它的“标准读者”——那种按照文本的要求、以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文本的读者，尽管并不排除对文本进行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艾柯的第三篇讲演所论述的问题与前两讲直接相连：“经验作者”（the Empirical Author）在诠释“自己的”作品时是否享有某种特权（这是所有的诠释理论研究者都不愿意轻易放弃的问题）。艾柯接受了为几十年前的新批评家所看重的下面这个观点：作者“前文本的意图”（pre-textual intention）——即可能导致某一作品之产生的意图——不能成为诠释有效性的标准，甚至可能与文本的意义毫不相干，或是可能对文本意义的诠释产生误导。然而，他的确同时又主张：“经验作者”必须被授予某种特权，以将某些诠释摒除于“合法诠释”之外，尽管他并没有很清晰地说明这些诠释之所以要被摒除在外是因为它是经验作者“意指”的诠释，还是由清晰可解、具有说服力的解读得出来的、可以接受的合理诠释。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艾柯对《玫瑰之名》一书的“经验作者”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一作品的“经验作者”正是艾柯本人，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本人又恰恰是这一作品的“标准读者”。

参加这一辩论会的其他三位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对艾柯的讲演做出了反应，也就是说其观点都根植于各自的“前理解”之中，尽管这些“前理解”经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罗蒂——根据美国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说法，罗蒂“是当今世界上最有趣的哲学家”——在美国发动了一场雄辩的、狂飙突进式的运动，力

图说服人们放弃处于西方认识论传统之核心的“对于根基与本原的欲望”(foundationalist aspiration)<sup>①</sup>。罗蒂论述说,我们不应再认为哲学的目的乃探寻“事物的本原”,乃“反映”自然,因此也不应将哲学视为其他学科的基础;相反地,哲学只不过是参与恒久常新、日新日化的“文化会话”的诸多学科中的一种,只要能满足我们的目的,适应我们的需要,任何音调,任何语汇,任何观点,都可以在此会话中自由地呈现自己,表达自己。罗蒂由此发展出他自己的那一套实用主义观点——这种实用主义观点与罗蒂以前的美国哲学家,如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等人的观点密不可分——认为思想、概念等观念形态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用以实现某些目的的工具,而并非用来表现“世界的真正本质”。从这种前提出发,在对艾柯的观点进行评述时,罗蒂首先指责艾柯不该将对文本的“使用”与对文本的“诠释”区分开来。它认为这种区分乃建立在下面这个前提的基础之上:文学文本具有某种“本质”,对文本的合法诠释即以某种方式去发掘、去阐明那个本质。罗蒂要求我们彻底放弃这种力图去发现“文本的真正本质”的想法;相反地,他要求我们认真地去思考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而得到的、对我们有用的形形色色的“表述”本身。罗蒂所发动的那场大规模的理论运动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以一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所“偏爱的词汇”,对传统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重新描述,并且使他下面的这个

---

① 这一运动几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是:“*The World Well Lost*”, *Journal of Philosophy*, 69 (1972);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1979);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Essays: 1972—1980)* (Minneapolis, 1982);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1989)。

观点也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人们逐渐发现，学术研究之所以能不断发生变化和取得进展，乃由于新的词汇、新的概念和新的术语的不断使用——这些新词汇、新概念和新术语比以前的词汇、概念和术语更有用，更有趣，更具启发性——而不是由于对以前的观点进行逐条的批驳和否定。（在任何情况下，要想有效地对某种观点进行反驳都不得不在表述了这种观点的现存概念和术语中去寻求支持。）这就使得他能够以一种刻意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对这种态度，有人激奋不已，有人怒不可遏——宣称，大量在历史上久持不下的问题已经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就目前所讨论的诠释问题而言，罗蒂认为，对“文本是如何运作”这一问题的探讨是大错特错、毫不值得的，作为快乐的实用主义者，我们对这样的问题应该弃而不顾。我们只应该探讨文本的“使用”问题，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无论如何，根据他的看法，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惟一一件事。）罗蒂这一观点无疑将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事实表明：这种观点如火上浇油，使关于诠释问题的争论不断升温，不断激化。

同时，罗蒂似乎也并不完全同意所有文本以及文本所具有的所有目的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因为他偏爱那些“将帮助你改变你的目的、并因而改变你的生活”（本书115页）的文本。在其论文接近尾声处，罗蒂为文学批评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的图景：这种文学批评并不是用一个精心建构起来的坚不可摧的概念的大栅栏去梳理它所解读的一切东西，相反地，它是批评家“与作者，人物，情节，诗节，诗行，或某个古代雕像相遭遇的结果；这些东西改变了批评家对‘她是谁，她擅长于什么，她想怎样对待她自己’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这种遭遇重新调整或改变了她的意图